

清代经济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梁治平：

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洪范的研讨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北京大学的李伯重教授来给我们作这样一个题目的报告——“清代经济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刚才我跟伯重教授说，洪范研究所以法律与经济跨学科的讨论为主要方向，涉及题目很多，但从历史角度来讨论问题的相对少一些。这并非我们不注重历史，但从历史角度来讨论问题，有它切入的困难性。其实在洪范研究所成立之初，也就是15年前，我曾经写了一个类似于章程的构想——经济与法律研究所到底研究什么？什么叫经济？什么叫法律？我当时给了非常宽泛的定义，那个定义中的法律不光是说“庙堂之高”的那些规则、正规的、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不止于此，而是一个社会秩序赖以建构的那些规则，哪怕是软性的、非理性的、非正式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的话，它跟经济关系密切，与我们的生活也关系密切。那么，从历史角度切入能否把这个层面揭示出来？从事这样的研究需要超乎想象的努力，而李伯重教授是非常适合的人选，他这次的题目也是当下亟待关注的问题。李伯重教授的研究在国内外拥有非常高的声誉，这些年伯重教授也在很多学术机构任职和合作。他的新作每次出来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比如大家看到的这本《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总之，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李伯重教授给我们作这样一个报告，期待我们能从历史当中去观察这个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走向。另外，我们也请到了两位资深的评论人，一位是清华大学的龙登高教授，一位是北大的颜色教授，相信接下来会有一场深入的讨论。好，现在就请李伯重教授作主题报告。

李伯重：

首先非常感谢梁治平教授给我这个机会，到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研究方面的看法。我过去虽然与梁治平教授没有见过面，但是多年前就读过他的文章，特别是他跟历史有关系的文章，所以这次很高兴能够和他见面，希望以后能经常向他请教。总之，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龙登高教授、颜色教授是多年的同行，但是坐下来讨论问题的时间不算太多。所以今天在这里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真是很好。而且，有这么多热心的朋友，今天冒着零下6度的寒冷跑到这里来参加这个讨论会，真是热情可感。对于大家的光临，深表感谢！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既跟历史有关，也跟现在有关，我要讲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二、为什么是清代？三、落后与停滞：以往对清代经济表现的主流评价；四、辉煌与衰落：新视野中的清代经济表现；五、以史为鉴：从清代经济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下面，我就顺着顺序一个一个来讲。

一、“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我十年前在海外教书的时候，给学生教经济史的一个开场白。这句话是狄更斯在《双城记》里非常有名的一句话，现在引用的人也比较多。我为什么引用这句话呢？因为我觉得，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这里我要引用军方人士金一南先生的一句话，这可以代表政界的一些看法。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当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巨大的风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最好”和“最坏”。

确实，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柏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他做过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早在 1990 年，他就说道：“18 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包括前苏联阵营）和北美，用了 250 年的时间，才使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 23% 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另外 23% 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那就是说，中国只用了西方五分之一甚至更少的时间，就可以进入工业化社会。他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今天，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我这一代人心里都有一个“俄罗斯情结”。但是今天大家看，俄罗斯虽然现在还是一个重要国家，但是整体的 GDP 还比不上我们的广东一个省。有人说俄罗斯人口少，所以人均 GDP 中国高。但事实是现在俄罗斯的人均 GDP 也比中国少。俄罗斯媒体报道说，2015 年，俄罗斯平均月工资约为 3.3 万卢布（人民币约 3,200 元），俄罗斯人收入历史上首次少于中国人。因此，当年的“老大哥”已经远远地被我们甩在了后面。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史无前例的超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在《纽约时报》有一位写了一篇文章《Accelerated Pace and Growing Pains》（速度与阵痛），后来被人翻译为中文，标题套用了 50 年代很有名的一首歌“马儿你慢些走”，为《中国，请你慢些走》。文中写道：“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就是说，中国的飞快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经济学界对今天如此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的看法则不同。例如管清友说：“有人说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大萧条，有人则称当下为 100 年未有之变局。”樊纲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张五常先生是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经济学家，他说：“我是对中国最乐观的人，我跟进了 35 年，以前的 30 年我都很乐观，最近的五六年我转到悲观了。到现在经济政策非常不明朗，听不到有些什么是我自己能够认同的政策，路向非常不清楚。”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前途到底也感到很迷茫。10 年以前，西方对中国经济是一片乐观，而现在英国《金融时报》就提出“中国经济模式神话破灭了？”的讨论。《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不连续状况的可能性是几十年来最高的；这种中断局面可能不是短暂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巨大挑战，他们必须在不崩盘的情况下，对不断放缓的经济进行转型”。过去“唱盛”中国的一些学者现在也转变了态度，变成了“唱衰”中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澜（Peter Nolan）教授前些时候出了一本书《China at the Crossroads》，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了中译本《中国处在十字路口》。罗澜教授是对中国非常友好、在中国也很受欢迎的经济学家，但是在这本书里他也尖锐地提出：“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走到十字路口，将会走向何方？”他认为有三种可能：1、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2、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3、退回到毛主义。现在前面就三条路，你走哪条？现在政界人物在考虑这个问题，经常学界人物可能在方面争议就更大了。去年“博鳌论坛”开始，最近也开始改变 2016 年的基调，多了一些温和与谨慎。

近 40 年来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经济奇迹，但也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觉得前途不是很明确，要找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为此，我们要回头看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所以今天我这个报告的标题就是“清代经济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罗澜说：“在寻求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首先可以转向中国的历史来寻找灵感的源泉。这种丰富的历史能够为‘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的道路提供思想营养，从而以务实的、探索性的和非意识形态性的方式制定政策来解决具体问题。”“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这都是我们改革开放时代的口号。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历史中取得共识，然后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这些。

改革开放，明年就 40 年了。到底什么叫改革？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 的《关键词》(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对“改革”(reform) 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改革, 意即回复到事物的最初形式”。我们在过去 40 年中进行的改革, 实际上就是把 1979 以前 30 年中否定了的许多东西作了再否定(也就是恩格斯说的“否定之否定”), 回到之前的形式。在前 30 年中, 我们对过去的历史, 哪些是经验, 哪些是教训, 几乎都是全然不顾, 一概加以否定, 想创造一种毛泽东所说的“白纸”, 以便“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 这样的“白纸”在人类社会里是没有的。只有正确地了解过去, 才能正确认识今天的情况。

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特色”, 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的这样, 中国特色的那样, 等等。那么, 什么是“中国特色”呢? 中国特色就是中国长期历史所发展出的传统。用柏金斯的话来说, 就是“经验的积累(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柏金斯在 1990 年就预见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前进, 出现起飞, 因为中国的过去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准备好了“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prior-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with complex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正是有了这预先积累, 因此有了合适的条件后, 才能够出现经济奇迹。不然的话, 经济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你把各种优惠条件给一个不具备这种预先累积的国家, 是不会出现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所以, 要了解中国特色, 就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

二、为什么是清代?

现在我们接到谈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是清代? 为什么我这里以清为讨论的对象, 而不以较近的民国或者较远的明代, 或者很多人心目中中国最辉煌的时代——唐代——为讨论对象? 我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清代和今天有较大的可比性。这些可比性包括: 政治统一, 疆域广大, 多民族和谐共处, 经济繁荣, 而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大家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在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之下。中央政府能真正管治的只是中国内地。民国时期是一个军阀割据的时期, 国民政府在 1927 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 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南广大地区基本上还是半割据, 所以民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清代就不同了。清代领土比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大得多, 除了现在的 960 万平方公里之外, 还多了 300 万平方公里。这 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被我们的邻邦(主要是俄罗斯)强占了, 到今天也不归还。所以, 如果从实际控制的疆域来说, 清代和今天是最接近的。

从人口来说,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 由许多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这个口号的朝代就是清代第一次提出的, 当时叫做“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清代最盛的时候是 18 世纪, 那时中国人口到达了史无前例的高峰——4.5 亿, 也就是以后一直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因此, 人口数量也是和今天最接近的。史景迁(Jonathon Spence) 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 曾做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他说:“我希望, 着力于对现代中国‘追寻’的过程, 将能弄清中国的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洞察它的现状。……在单一的政体中统治十亿公民, 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就在十八世纪, 中国首次出现沉重的人口压力, 从那时开始,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经济和民间社会管理的影响。……”。由此可见, 由于人口众多, 在 18 世纪就出现了人口压力, 对经济和社会有重大的影响。

三、落后与停滞: 以往对清代经济表现的主流评价

以为我们对清代的看法, 就是四个字——“落后停滞”。以前教科书里的标准说法是: 明

清是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所谓“没落”，不仅是停滞，而且是衰落。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全国学术复苏的时候，王宏钧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说“从万历到乾隆是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 300 年”。乾隆以后的历史，可能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提及，因为一直是外患内忧。宋史界权威漆侠也是对 2000 年中国历史变化作了一个宏观的描述。他说，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两个马鞍形”模式，即在秦汉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低落，隋唐有所恢复和回升，到宋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急遽下降，明代中叶恢复到宋代水平，以后虽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迟缓和停滞。以上看法，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来对清代历史的主流认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认识是通过教科书灌输的，已经成为一种全民共识。这并不奇怪，因为西方也是一样。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中国没有进步，只有“纹丝不动的单一性”，所有的“变化”，即战争、杀戮、掠夺、篡位，不过是“重复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这是西方从 19 世纪对中国的看法，这个思想支配了很长的时间。在黑格尔之后，西方对此观点有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德国学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说：“（清朝）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另外一位德国学者，即革命导师马克思也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木乃伊就是没有生命的干尸，完全停止了生理活动。西方对中国的这个看法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到了 20 世纪中后期，许多人仍然这样看待中国，例如艾蒂安·巴拉兹说：“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法国著名学者阿兰·佩雷菲特 1968 年来中国访问，回去后写道：“1960 年 8、9 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夏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西方人到了 20 世纪中期还是这个看法，所以可以看到中国主流的看法和西方的看法真是相映成趣，不约而同的。

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出现了一个变化。美国中国问题研究权威费正清在抗战时曾在中国生活过，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地抵抗日本的侵略感到很敬佩，他质疑和挑战对传统的中国停滞论，提出了他的“冲击—反应”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近代并未停滞，相反倒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冲击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冲击是指来自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及文化等方面一系列的影响。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主要表现为中国为适应现代化进程而做出的一系列的改良和革命，勾勒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面貌。

这种认识后来又变成了我们教科书的主流看法。今天我们的教科书划分中国古代和近代是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界线，就是这个看法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是“近代”，以前是“古代”。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被定为中国历史从“古代”转向“近代”的起点。你们中学读的教科书中就是这样说的，就是受了这个主流看法的支配。

四、辉煌与衰落：新视野中的清代经济表现

在 20 世纪后期，学界出现了对清代非常不同的看法。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他那本非常有名的书《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AD)里，综合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7 世纪末到 19 世

纪初，清朝（就是康、雍、乾三个皇帝）接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清朝在经济上表现出极为出色。“极为出色”的原话是“Extremely well”，不是说一般的好，而是非常好。但是他接着说：“从 19 世纪中国经济表现得令人失望”。他主要是综合西方学者对清朝研究的一个最新的看法。实际上，西方学者在他之前很久就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何柄棣先生是中国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华人历史学家，他认为“18 世纪中国生活水平呈上升之势，1726 年中国近 1% 的人口超过 70 岁，其中还有活到百岁的老人。18 世纪中国农民收入不低于法国，肯定高于普鲁士（Prussia）和日本。”活过 70 岁，在今天似乎不算什么。北京现在人口的平均年龄是 80 岁，全国人民平均 70 岁。全世界寿命最长的，妇女是日本，男人是香港，都是 80 几岁。但是在 18 世纪，活过 70 岁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他认为 18 世纪中国农民的收入不低于当时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法国，肯定高于除中国之外亚洲最富裕的国家日本。对中国经济作一个更宏观评价的是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肯尼迪（Paul Kennedy）。他在其 1982 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一书中作了一个估计：18 世纪中期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 8 倍，英国的 17 倍，到了鸦片战争前十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 3 倍，法国的差不多 6 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才是中国的 40%。当然他是用二手材料作的研究，他的估计也是有很大问题的，不过他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过去对清代的看法可能是不对的。一位很有争议的学者贡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在他的《白银资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也是用的二手材料。得出这样的结论：“1820 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到 1800 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这和我们教科书给我们呈现的“清朝是一个衰败垂死的没落的朝代，西方经济是一片蓬勃发展，而中国经济是一片漆黑”的图像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另外一幅图像。那么其他一些学者的看法呢？20 世纪末期，法国经济学家贝洛赫（Paul Bairoch）与列维·列波伊尔（Maurice Levy-Leboyer）提出：1800 年世界“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 198 美元，所有“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 188 美元。那时候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很小，但是中国高居世界第一，为 210 美元。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大概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所以整个世界的人均收入被中国抬高了。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这些看法都是一些估计，并不是很精确的。尽管如此，但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我们过去对清代的看法肯定是错误的。

刚才说的是平均收入问题，接着我们再看财富的积累问题。我们来看看屏幕上的这两个人。一个是英国金融家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 1808-1879）。他们五兄弟分布在五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建立了庞大的金融网，而内森是这个金融家族的大家长，也是 19 世纪中期整个西方世界最富有的人。另外这个人叫伍秉鉴（1769-1843），中国经济史基本上不讲他，但在西方很有名。西方人叫他 Howqua，即他的小名叫“浩官”的音译。他是一个广州的行商，做外贸生意。我给大家看这两个人有什么意义？内森 1828 年，他的财富合计达 530 万美元。那时候一个加拿大农业工人每天的工资才 80 美分，你想他有多富有？但是伍秉鉴的财富合计 5600 万美元，是内森的十倍还多。《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Daily*）把伍秉鉴列为世界千年 50 富之一。我在国外教经济史，要学生读一些有趣的书，其中一本是畅销书《富人和富人怎么致富》（*The Rich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 How the Wealthiest People of All Time--from Genghis Khan to Bill Gates--Made Their Fortunes*）。这本书列出了世界在过去一千年中，从穆斯林君主加兹尼（Machmud of Ghazni）到比尔·盖茨的十大最富的人。其中唯一的东亚人和唯一的商人就是伍秉鉴。伍秉鉴之所以被西方提及那么多，就是他专门做美国的生意，所以他的很多资料在美国保留下来了，而在中国，因为经历了多次内乱、战争、政治运动，资料都没有了。但是伍秉鉴还不是中国最富有的人，有的扬州盐商比他还要

富。他们积累了如此巨大的财富，是通过商业达到的，不是像和珅那样通过政治权力捞来的。由此，你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繁荣的程度，也可以看到中国商业的发达程度。

关于 17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中国经济的评价，麦迪森在他的书里作了总结，认为清朝在经济上表现得非常出色，看人口从 1.38 亿增长到 3.81 亿，增加速度是日本的 8 倍，欧洲的 2 倍，但是清代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人口快速增长而生活水平不下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中国国民生产增长的速度还是最快，这可能也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麦迪森作了比较：1700 年时中国经济规模并不是世界最大的，最大的是欧洲（不包括东欧），印度第二，中国第三，但是到 1820 年，则是中国第一，欧洲第二，印度第三。这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最快。能够持续几乎一个半世纪的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这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的规模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1820 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是这时一个大转变出现了，1820 年以后中国经济一直下滑，在 1820 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在衰落，1913 年中国 GDP 在世界 GDP 中的份额为 9.1%，1952 年下降到 5.2%。1820-1952 年间，中国人均 GDP 年增长率为 -0.8%，而印度为 0.10%，日本为 0.95%，欧洲为 1.03%，美国为 1.63%，俄国为 1.04，世界平均为 0.92%。1913 年中国人均 GDP 为世界人均 GDP 的 36.7%，1952 年下降到 23.7% 是世界 6 大经济体中唯一出现了负增长的经济体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如果按照 18 世纪来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了不起的朝代。

五、以史为鉴：从清代经济史中汲取经验教训

从清代经济的大变化中，我们可以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首先，是国家所起的作用。“中国特色”的一个主要要素就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福山在近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特别讲到：“中国历史上，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文明没有的。到今天为止，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各大经济体中所没有的。”

关于清代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传统的看法是，清代国家专制而且腐败，不仅没有采取措施来积极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打压工商业的发展；清代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工具，保护地主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的残酷剥削，并将剥削所得全部用于挥霍靡费而非扩大再生产；清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不保护产权；清代儒家价值体系和教育制度抑制发明创造精神；等等。我们的教科书一直如此告诉我们的，也是一般中国人民对清代持有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在 20 世纪后半期，全汉升、克劳斯（Richard Kraus）、何炳棣、谢和耐（Jacques Gernet）、柯文（Paul Cohen）、罗威廉（William Rowe）、罗友枝（Evelyn Rawski）、魏丕信（Pierre Etienne Will）、艾尔曼（Benjamin Elman）、濮德培（Peter Perdue）、曾小平（Madelaine Zelin）、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王业键、梁其姿等学者开始质疑这个看法。但这些学者全是海外学者，因为中国当时的政治氛围不允许质疑。到了 21 世纪初，罗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张，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传统的中国政府坚定地鼓励市场，但不允许商业、金融利益集团和投机业控制政治和社会。不仅在直接的增长问题上，而且在广泛的社会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政府都介入到市场失败的地方中来。在专制帝国统治的大厦的背后是普遍的道德规范，而这种道德规范的基础是所有社会阶层为了维持社会团结、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而克尽职守的必要条件。当这些功能有效运转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和谐，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当它们运转不佳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动乱，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这个看法和中国大多数人的看法截然相反。这里我们来

具体看看，清代国家对 18 世纪的经济繁荣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我认为清代国家的贡献在于：实现了国家安全与稳定，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财税改革，建立了小政府，开展了社会改革，政府退出经商，建成国内统一的市场。这些都是清代政府所做的积极贡献。在这里，我将选其中的几项和大家一起讨论。

说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我们中国的北方是内亚和中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游牧地带。这里人民生活艰苦，社会不稳定，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战争。战争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一旦南部农业民族防御能力减弱的时候，他们就要向南侵入，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这是中国 2000 年来的噩梦。这些游牧民族最大的一次战绩当然是成吉思汗的大军从蒙古高原出发，然后征服了整个世界，他建立的蒙古帝国到今天为止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政治体。

为了防备北部的游牧人入侵，中国历代建起了长城。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明长城。大家赞叹长城的雄伟，认为是中国的伟大成就。实际上，如果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角度看，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因为打不过人家，所以花如此巨大的财力、人力来建筑长城。明长城的修建时间超过 200 年。有人估计修建明长城。使用了砖石 5000 万块（条），夯土 1.5 亿立方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程，你想要花多少钱？只有长城，并不能真正阻挡蒙古人的兵峰。在明代中期的“土木堡”之战中，明军崩溃，蒙古大军一直来到北京城下。如果没有于谦坚持抵抗的话，北京就沦陷了。为了抵御蒙古人，明朝在长城沿线设立了 13 个边镇，驻军开始是 30 多万，后来增加到 60 多万，接近 70 万。这些军队不仅要吃饭、穿衣，而且还要配备武器（包括价格昂贵的火器）。隆庆三年，明朝为驻扎在城墙上的 6 万人配备了大炮 8000 架，火枪 12000 支，火药 150 吨。这全是内地特别是南方生产后运送过去的。这还仅仅是长城敌台上的配备，还不包括城下驻军的装配。根据台湾清华大学赖建成教授的研究，明朝边军的开支，每年所编列的银两数从嘉靖十年的 336 万余两，暴增到万历十年的 827 万余两。这 827 万两的边镇军费，是万历六年太仓银库每年收入 367 万余两的 2.25 倍。所以北方边患对明朝一个巨大的负担。不仅如此，明朝晚期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产物就是各种技术和知识迅速地传播。在这个时期，火器技术不断改良，而且迅速传播。美国军事史学家富勒（J. F. C. Fuller）说：“火药的使用，使所有的人变得一样高，战争平等化了。”所以，这时新兴的东亚地区的强权安南（今天的越南）、日本、缅甸对明朝形成了严重的挑战，然后新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在东北新兴的后金，也都是明朝强劲的对手。他们都比蒙古人还要厉害得多，因为他们都使用了先进的火器为了对付这些敌人，在明朝最后的半个世纪中，和他们打了 4 次大战：中缅战争、中日战争、辽东战争、台海战争。每一次大战按照当时欧洲的标准，都是世界大战。比方说中缅边境战争，缅甸两次进攻中国，都出动了 30 万大军，而在欧洲最大的战争“三十年战争”中，最大的战场兵力投入加起来不到 20 万。缅甸军队在战争中使用先进火器，把俘获的葡萄牙人和穆斯林组成火器部队，进攻明朝。朝鲜战争被认为是东亚第一场近代化的战争，中日在朝鲜血战几年。然后是台海战争，明朝方面是郑成功家族，对手是荷兰，当时荷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郑氏集团和荷兰的战争打了很多年，最后是郑氏取得全胜。欧阳泰最新的研究表明，郑成功的武装力量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用的是大炮、船也是最先进的，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场大规模的近代海战。这些战争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在新出版的那本小书《火枪与账簿》中有一节的题目是“祖国在危险中”。“祖国在危险中”是法国大革命时，面对欧洲各国的围攻，法国革命政权提出来的口号。后来到了二战期间，纳粹进攻苏联，苏联又提出了这个口号。所以，除了蒙古人之外，还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越南人、缅甸人、日本人都向在中国施在压力，进攻中国。

到了清朝情况大变。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每战必败，大家就认为清朝军队不堪一击，士兵梳着辫子，拿着标枪，怎么打仗？然而，上按照军事史学家布莱克（Jeremy Black）的说

法，18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有两支，海军是英国，陆军是中国。他说：“在18世纪的世界里，陆地上最有活力的国家和最成功的军事强国是中国。中国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开始扩张，占领了台湾（1683年），把俄国人逐出了阿穆尔河流域（1682-1689年），战胜了准噶尔人（1696-1697年）。在18世纪，中国继续着此过程，于1700-1760年间，最终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控制了远至拉萨和巴尔喀什的广大地区，合并了新疆。中国1766-1769年间对缅甸的军事行动不太成功，但是当尼泊尔的喀尔喀人开始扩张并挑战中国在西藏的地位时，1792年中国军队前进到加德满都，迫使喀尔喀人承认中国的权威。”清朝对缅甸的战争不太成功，主要是缅甸盛行热带病，连清军统帅都病倒了，无法作战。这么一支强大的军队，使得中国领土达到1200万平方公里，是明代的两倍。新纳入清朝统治的地区人口稀少，只占中国总人口的2%，但是清朝占领这些地方，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安全，这些地方为清帝国提供了一层外围保护。由于国力强大，在明代一再向中国挑衅的越南，到了这个时候都跑到清朝来朝见清朝皇帝，还专门梳了辫子，换上了清朝的服装，朝鲜的使臣讥笑他们：“你们怎么变得这么快？”明朝时荷兰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所以一直不来朝贡。但到了清朝，荷兰使团来朝贡了6次之多。清朝在那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就创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而且大大减轻了国防的压力，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清朝疆域和人口都远超历代，但是清朝的赋税没有增加。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清朝政府实现了“永不加赋”的承诺。人口在增加，经济在扩张，但是赋税却没增加，这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见。因此，这就使得民间财富迅速扩张。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清朝人均赋税在鸦片战争以前的18世纪是全世界最低的，清朝政府的整个开支在全国GDP中的比重是5%左右，也是全世界最低的。因此，清朝只需要建立一个小政府，就能治理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全国的官员只有两、三万人，军队总数也只有60万人，其中20万八旗，40万绿营。此外还有大量的衙役，总数共两三百万人。因此清朝的官民比率，连今天零头都不到。马德斌等人作了一个历朝的人均赋税的比较，由此可以看到18世纪的清朝人均赋税比宋朝、明朝都低很多。

清朝还建立了广大的国内市场。原来在明朝已经形成一些大规模的长途贸易，但它没有形成一个很稳定的贸易系统。明朝在长江沿岸、大运河沿岸有大量的税关，向国内的贸易的商品征税。清朝大量地取消了税关，因此商品流动税也大大减少。清朝在贸易方面很多时候采取促进的政策，比方在珠三角，大量的土地用于种棉花、织布。为了鼓励商人到越南、泰国去买米，买到的米达到一定数量就赏他一个官。由于这些努力，在18世纪中国出现了全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市场里，货物和各种生产要素基本上都可以自由流动。因此，清代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浪潮。内地人口向西南、东北、湖南、江西流动，“湖广填四川”、“江西老表”、“洪洞大槐树”、南京柳树湾等移民故事不断出现。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形成了八个大经济区。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将其总结为（1）东北，（2）华北，（3）西北，（4）长江上游，（5）长江中游，（6）长江下游，（7）东南沿海，（8）岭南，（9）云贵。这些经济区内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然后通过运河、长江和海路联系在一起，从而造成大规模产品流动。吴承明先生估计19世纪中期中国跨地区贸易的大宗商品在全国产量中和全国贸易量中的比例分别为7%和20%。而依照我的估计，如将所有进入长途贸易的商品合计，总值应接近于贸易总值的30-40%。这是非常高的比重。对比一下其他国家，在19世纪，大多数国家贸易的主要商品是农产品。在美国1820年农业的商品率约为25%，1890年日本农业商品率约为20-30%，都是属于自给性生产。1870年美国农业商品率超过50%，成为商业化生产。中国农业产品的商品率在1976-77年为25%，扣除返销粮只有15%左右。

随着资本的大量流动，清朝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为促进资金大规模、长距离的流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山西商人建立起了其全国性的金融网络，即账局和票号。

票号的总数，在 1823-1827 年间从 1 家增至 11 家，其分号遍及中国的 27 个主要城市，每个分号汇兑金额在 50 万至 120 万两之间，而存贷款总额则在 30 万两。到了 1906 年，仅只日升昌一家票号就汇款 3,200 万两。全国 22 家票号汇款总额达 8.23 亿两。有了这种汇兑机构，你要做生意，可以带着一家汇票走遍全国，因此生意就变得很容易做，资金流动变得非常容易。票号遍布全国，连国外的圣彼得堡、横滨等地都有票号的分号。另外，明代已经出现了强大的商人集团即商帮。明朝以前，中国外贸掌握在外国商人人手里，到了明朝，中国本土商人兴起，到了清朝发展成为有名的“十大商帮”。“十大商帮”非常强大，统治着国内市场。

在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清代中国形成了紧密的地域分工。中国形成了四大经济地带，即发达地带、次发达地带、发展中地带和不发达地带。财富和资金、技术从发达地区地流向发展中地带，而原料和粮食则从发展中地带和次发达地带流向发达地带。在这个了更大规模的地域分工中，处于发达地带中心的长三角，也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为什么长三角一直如此发达，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富裕的地区？因为它一直处于市场中心的地带。为什么香港总是不能够和长三角竞争，因为它不在这个市场中心。这个市场是在清朝形成的。市场是近代工业化以前近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核心，市场越大、市场越完备，好处就越多，所以清朝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了，保持了清朝非常大的霸主地位。

但是清朝的政策也有很大的问题，是清朝统治者将“持盈保泰”作为自己的基本为政目标，而“持盈保泰”的核心是稳健而保守。这导致了 18 世纪清朝国家政策的缺陷，即不鼓励海外发展，不鼓励创新，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缺乏有效法治，不能抑制腐败，等等。

清朝政府不鼓励海外发展，主要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因为海外华人反清活动很活跃。同时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因为中国已经够富裕。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那封有名的信中写道：“天朝抚有四海，...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也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他们说得很清楚：中国不需要你们。在这种“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的心态下，清朝政府当然不鼓励创新。这种固步自封的思想在军事技术上表现得非常典型。明朝末年翻译了不少军事书，明朝人自己的也写了不少军事书。但是这些书在清朝都被禁了，或者就是失传了。黄一农说：“清朝前 150 多年大量兵书当中，竟然没有任何讨论火炮的专门书籍出版。到雍正（1723—1735）末年，清政府发现驻防的守军，从来没有做过火炮演练，以至于准头的远近、星斗的高低，官兵茫然不知。即使到了道光年间，用铳规量度仰角以调整射程远近的方法，仍然是‘中国营兵所不习’”。因此到了鸦片战争时，清军还在使用着明朝铸造的大炮，而明军已经会用的许多测量仪器，清军都不会用。事实上，到了清代中期，清军已非常腐败，毫无战斗能力。嘉庆朝发生于楚交接地区的白莲教起义，攻破州县 204 个。为了镇压这些使用最原始的武器的农民起义者，清朝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大批军队，耗费军费二亿两。但是清军战场表现极差，被击毙的提镇等一二品大员多达二十余名，副将以下将弁更达四百余名，用了九年多的时间，才勉强将此次起义镇压下去。鸦片战争之前几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轻蔑地说：“（像清军这样的）一支使用弓箭和长矛的军队，在对抗一小批经验丰富的英国军人时，能干些什么呢？”。确实如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林则徐在谪戍伊犁途中致书友人说：“彼（英国人）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辄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因此清军在 19 世纪后期的一系列战争中不断败北是完全不奇怪的。

清朝政府没有办法维持国家安全稳定，不能有效对抗国际环境变化，也不能有效进行改

革。到了 19 世纪后期，“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但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了官营垄断经济的兴起。本来清朝在经济上是和前朝非常不同，政府不经营工商业，所以明朝大规模的船厂没有了，就是连为皇室生产高级消费品的“江南三织造”和景德镇御瓷厂，也变成了采买机构，自己不再生产产品。外贸，清朝也交给商人去做。但是到了“洋务运动”，出现了官营垄断经济。

到鸦片战争之后有很多人提出改革，清朝统治者也不是不想改革，但是他们有两个无法绕过的障碍：第一，不愿意触动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第二，没法有效克服腐败。

清朝有个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旗人。清朝政府的政策是“不分满汉，但问旗民”，这是台湾学者赖惠敏写的一本书的标题。“旗人”就是八旗里面的人口，“民人”就是八旗之外所有人口。“旗人”有“十定”，即第一，定身份；第二，定旗分；第三，定佐领；第四，定地；第五，定钱粮；第六，定土地；第七，定营生；第八，定学校；第九，定婚姻；第十，定司法。这使得旗人成为高居于各族人民之上的特殊族群。旗人的身份都是世袭的。如果你是旗人，在哪一个旗，上司是谁，住在什么地方，都是世袭的。北大、清华附近有个蓝旗营，更远些地方有镶红旗等，都是旗人的特别的住地。

清朝对于旗人的开支是从摇篮到坟墓，都要负责的。最普通的旗人，从生下来那天起，每个月就有一两银子的津贴，一直到死。清朝政府还分给每个旗人土地，但旗人后来都不种地，都把它卖掉了。清朝政府规定旗人不允许经商，担心他们腐化，因此他们的出路就是做官、当兵。每个男性旗人到读书年龄有特定的学校读书，是免费的。考科举时他们有特殊的名额。清朝规定旗人不准同民人通婚。清朝在官制上标榜“满汉一体”，中央的六部长官满汉各两个，两个满尚书，两个汉尚书，但实际上都是满人控制。汉人和满人的人口比例差了几百倍，但是官位却一家一半，而且权力都控制在满人手里。清朝所有官职岗位分为满官缺、蒙古官缺、汉军官缺、汉官缺四种，不同官缺只能由本族群的人出任或补授。因此康熙时汉人督抚“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但总督大都是满人。

旗人享有司法特权。凡属满人违法犯罪，一般可享有“减等”、“换刑”等特殊优待。例如：笞杖刑可换折鞭责，变相减等；徒流刑可换折枷号，免于监禁服役或发配远乡；杂犯死罪和仅次于死刑的极边充军，也可换折枷号；死刑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窃盗罪可免于刺字；重罪必须刺字者，则刺臂而不刺面。对满人案件的审理，由特定司法机关管辖；对满人的监禁，也不入普通监所；宗室贵族入宗人府空房，一般旗人入内务府监所。

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Elliott）说：“族群主权在清朝特定、无情地统治着中国，它是一个昂贵的事业。”由于各方面受到优待，旗人人口增加得非常快。清朝入关的时候，进到内地的旗人连同家属总共才几十万。到了清末，仅只是旗人中的满洲八旗的人口就已增加到 100 多万，连上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人口更多。今天原来的旗人后代都算满族，人口总计到 1000 万。清朝对于旗人是从摇篮到坟墓都要负责的，所以养活这个不断膨胀的特权族群，也成为清代国家越来越大的负担。这个特权集团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特权社会中。清廷规定八旗子弟不得随便离开旗地，不得从事民间技艺，不得经商，不得与民人通婚。他们的主要出路是当官、为吏、当兵吃粮。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但是还受到抵制。光绪皇帝进行“戊戌变法”的时候，慈禧太后原来没有反对，到了后来，下层旗人大批地跑到颐和园去，包围起来，跪在那里哭声震天：“皇帝不要我们了。”慈禧太后作为旗人集团的大家长，当然首先考虑是维护旗人的利益，所以发动政变。这个特权集团是不愿和广大汉族人分享权力的，到了清朝最后的日子，还成立“皇族内阁”，由旗人中的皇族组成内阁。清朝特权阶层的利益是没有办法撼动的，所以清朝也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变。

清朝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腐败。清朝统治者不是不重视反腐问题。因为看到了明朝末年贪官的危害，清朝入关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严惩贪官，顺治皇帝说“治国安民，首在严惩

贪官”。为此，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反腐，这些措施包括：（1）立法：始纂于乾隆八年的《钦定台规》，是中国廉政史上第一部监察法典；（2）机构：加强都察院的作用。无论何人“不法”，都察院均可直言不隐，并且“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并建立了直属于皇帝的独立审核机构“会考府”；（3）创建养廉银制度：予官员以合理待遇，此外收入即为非法；（4）约束特权阶层：管束八旗子弟，不允许他们从商，与民争利，对高官、高官子弟实行任职回避制度，等等。

清朝历代皇帝也都重视反腐。雍正皇帝说：“同通不规，扰害百姓。此等不肖种类，当一面拿问，一面参处。在此人身上追出数十万金以养尔山东百姓，不是好事么？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人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这真是够严厉的！陈志武教授的团队作了一个清朝对贪官抄家的研究，由此可以看到历朝反腐的力度都不小。其中被称为盛世的乾隆朝抄家次数最多，也抄得最厉害，比如乾隆46年“甘肃冒赈案”，因为灾荒，一些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贪污公款。参与其中的贪官人数众多，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100多人。乾隆皇帝说：“俾触目惊心。共知侵贪之吏，天理所不容，即国法所难宥”。于是予以严厉处罚，有56个官员被处斩，46个官员被发配边疆。甘肃省几乎所有官员都受到了处理，甘肃官场出现了塌方，共追缴账款达281万两白银。在乾隆一朝，诛杀二品以上的贪腐大员共22人。但是贪官却不断滋生。陈志武教授的研究指出：王亶望（1781年被杀），贪污达300万两银，和珅（1798年被杀）家产更达1.18亿两银。（**龙登高**：和珅好像是500多万两银子）。是吗？陈志武他们的那篇文章里是这样写的，我没有考证。（**龙登高**：这是最新的数字）。据事后公布抄家结果，和珅家产共编为109号项目。仅估价的26号（还有83号未估价）折合银两为2亿2389万两。而据梁启超估计，和珅的全部家产约合银两8万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10年的财政收入。他每年聚敛的财富等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嘉庆皇帝杀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所以当时民谚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大小官员还利用权力，向商人索贿。前面提到行商伍秉鉴，他在1842年12月23日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库兴（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因此美国人评论说：“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伍秉鉴）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

反腐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去入手，是没有办法根本解决的。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孟德斯鸠也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由于清朝统治者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清朝走向衰落的是必然的。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历史呢？因为只有历史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什么？我们将来会走向哪里？欧立德说：“历史不会循环，但它会押韵”。清朝的情况会重现，但它会押韵，它会遇到共同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诺斯说“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鲁迅先生说：“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

就讲到这里。谢谢！

梁治平：

谢谢伯重教授！伯重教授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里面涉及三个部分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对当下经济或者说我们当今所处时代境遇的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充满了内在的紧张，希望和危机是并存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解释。这里涉及数十年来史学研究方面大量不同的观点、材料、思考以及相关的争论，这也是伯重教授非常熟悉的领域。根据伯重教授的叙述，我们看到，早期教科书的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一种东方主义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在反思这个问题，今天的历史叙述也因此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从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汲取一些什么样的教训、经验或智慧。我想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现在我们就请两位评议人对这些问题做一些讨论，先请登高教授。

龙登高：

非常精彩的演讲！尽管我跟李伯重教授经常在一起，但他这个演讲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比较宏大的历史画面。我想清代的成功与教训可能就是在三方面：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下，还有一个是对内。对外和对下应该说它比较成功的，而对内就有很多教训。

对外，因为它本身就是游牧民族，所以在防患游牧民族以及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使其能够实现长达 200 多年的和平时期，当然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那是另外一个变化。但是在传统的格局之下，使得它能够减少军费，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这是很难得的。当然，这也是它的特殊性。如果和宋代、明代相比较，为了防范和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宋与明的军费开支非常大，而清代在这方面不需要太多的负担，这是它一个难得的条件、难得的机遇，当然也是和它的政策相关的。与此相关也就是使得它失去了对外竞争的倾向、政策和选择，所以一遇到西方侵入，它就无法与它们相抗衡、相竞争，这是对外方面。

那么对下呢？刚才伯重老师所谈，它对维护一个国内统一市场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商品和资源的流动，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清朝还有一些制度安排，比如说旗人不得经商，因为一旦他经商，就会形成特权阶层和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在这方面它有一系列的政策，虽然不能说惠商政策，但在某种程度它在这方面也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所以清朝的“大一统”市场比同时期大英帝国的市场更大，但是清朝的成本更低。为什么？大英帝国为了维护其殖民地市场，需要很高的成本，因为市场没有规则，它需要强大的武力来维护市场的秩序，而清朝它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就实现“大一统”的市场。

在对下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那就是清朝对基层百姓的经济生活是自由放任的。对内、对官僚、对特权阶层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对基层是不管，比如刚才说到“永不加赋”，老百姓你们可以自己谋生，它可以低税让你们获得更好的条件。这点因为我感受比较深，要如何低成本的维护一个“大一统”的政权，中央政府如何控制基层？是用强力去严加控制和渗入基层？还是让他们自由 *Leave them alone*，即给基层自由？从长远来说，从成本与效率来说，当然是前者更好。就像美国一样，美国为什么没有人要求独立，要求离开美国？因为基层和地方已经相对独立和自由。而清朝呢？对基层民众来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历史条件之下，也能够获得自由。你可以看到人口的流动、资本的流动，还有我们所说的产权保护、土地交易市场，就是说，在基层和市场方面能够通过实现要素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所以这是清朝经济发展和在短缺的经济时代之下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基层、市场和经济在生产要素与资源的流动之下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所以在当时的技术和条件之下能够使市场和经济的效率与产出达到可观的程度，应该说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这是对外和对下。

麻烦的就是对内，这里所说的对内就是指对官僚、对特权阶层，这个不仅是清朝，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对官僚，这里我稍微说开一点，有的人说“中国的皇帝最坏，皇帝可以

随意地掠夺民众的财产、掠夺土地。”坏皇帝的确存在，但作为常态与制度，不能这样去思考。在我们湖南，2000 多年来没有一个皇帝到过，那么他怎么去掠夺我们的财产呢？派官吏？事实上其最稳定的收入就是税收，是不是？而实现税收就要通过官僚体系。在这种委托代理之下，官员有他自身的利益，所以皇帝最头痛的就是不得不依靠官僚体系。如何激励官员为了皇帝的利益去努力，同时约束官员不要去通过寻租谋取自身的利益？清朝皇帝都很勤政，也建立了一套一套的制度，但仍然是防不胜防。那么如何抑制官僚体系对民间的掠夺，防止官僚体系和皇帝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之下，追求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在委托代理制度下是很难处理的。可能现在唯一能够成功的就是基层民主自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让群众来监督官员，这是唯一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就像现在的美国和西欧。

特权阶层，是清朝立国之基，也就是其权力的来源，所以清朝要保障其特权阶层的利益。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会保障其特权阶层的利益，因为这是最核心的力量源泉。明朝皇族这个特权阶层所造成的负担，根据学者大致的估算，最初仅占税收总额的约百分之一二，到明朝后期逾 30%，接近庞大的军费开支。清朝是旗民阶层，负担也是越来越重，正如刚才伯重老师谈到的。我估计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估计，可能比明朝的皇族这个特权阶层是不是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它会成为清朝政府越来越重的负担。现在中央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官僚、对特权阶层自身的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想历史上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必须汲取的。这就是刚才听了伯重教授所谈后我的一点感受，就是：清朝对外和对下基本上是成功的。对内？虽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很难说成功，或者说给它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皇帝的最高追求实际上并不是税收最大化，而是统治的可持续性。清朝之所以在 19 世纪末以后崩溃，更主要的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发展得太快，而它仍然保持着保守或者说封闭，就使得它跟外面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好在有了 WTO 的规则。为什么清朝改革开放失败了，而现在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成功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规则使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不一样。在武力规则下，落后就要挨打，是清朝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落后不会挨打，反而会得到救助；但不遵守国际规则，就会受到唾弃。

我再补充一点。现在不少历史爱好者包括许多学者，还在拿着二、三十年前的教科书或者是通史性的著作，来构建其历史观念，来建立模型，甚至构建宏大的框架。这极有可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会形成更糟糕的对历史的认识，因为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经济史学的成果日新月异。谢谢！

梁治平：

好的，颜色教授。

颜色：

感谢梁所长！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聆听伯重老师给我们讲清代的经济史。我感觉伯重老师讲的远远不只是清代史，其实是整个政治史、社会史或者说他是一个全球眼光来看清代。伯重老师是我的师长辈，我主要是来学习的。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时间关系，我感觉伯重老师有很多东西没有展开讲。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跨学科的交流，伯重老师可能对有些问题更多的还是从大宏观的层面来谈。我想跟伯重老师以及在座的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不当的地方请各位批评。而且我们是一个内部讨论，所以我说的比较直接。我个人非常感兴趣清代的历史，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一个是刚才几位老师都说到清代其实对

现代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因为我觉得“清承明制，明承元制”。清朝非常深刻地汲取了明朝教训，比如说对宦官、对党争都是深刻地汲取了明朝的教训。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与清朝类似，虽然我们国土在晚清丢失了不少，但是依然是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市场和国家，我们现在跟清朝有很多地方是押韵的。我觉得“押韵”这个词用得特别好，我们面临的很多状况都很像，所以我觉得研究清朝对现在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第二，我的很多研究是从数据的角度去研究经济史，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所以我感觉清朝最大的好处就是数据保留得非常多，可以用很多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因为明朝很多数据都丢失了，但是清朝大量的保留，因为是和平政权的交接，所以清朝的档案保留得非常好。因而我们不仅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经济史，还可以研究清朝政治史、社会史等等，所以我觉得清朝对我写论文比较方便。

我个人是从两个角度去理解清朝：首先我理解的清朝就是它的政权体系，从皇帝和最精英的贵族角度看，我觉得它是一个少数民族占领中国的政权，这一点我特别想指出来。它入关的时候其实人数比较少，它在征服中国整个过程当中先是靠洪承畴，后是靠吴三桂，包括它开始的时候用了很多满官，但中期以后越来越依靠汉族的力量，所以它是少数民族统治和汉族部分精英联合起来统治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这就说明了这个最高领导人和最精英的贵族、皇族有很强不自信、不安全感。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一会儿再把它深入地阐发一下。第二，我个人认为，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李老师可以批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强烈感受。我很喜欢龙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清朝的市场规模非常大，成本又很低，这就注定了它在统治方式上有些自己的特点。所以，这两点相结合（一个就是政权上的不自信和不安定，以及市场规模非常大），我觉得就体现出好几个特点：

第 1，它面临不停地冲击它的反应。第 2，它的统治模式的变化。统治模式上的变化龙老师刚才说了，第一个就是清朝出现了第一次的绿色革命。我们改革开放 80 年代初的时候，农业发展得这么好，一方面是产权的变革，另外一方面是大量地利用了 70 年代绿色革命的成果，化肥的引入。但是我觉得在乾隆之前或者康熙前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新世界作物的引进。由于新世界作物的引进，才导致了刚才伯重老师讲的一亿多人到了 3.8 亿人。我觉得麦迪森的这些数字大体是可靠的。但是我对于人均的数字是有所质疑，如果从马戛尔尼的书上来说，他看到乾隆后期人均的生活水平状况其实是比较差的，有大量的溺婴现象。伯重老师知道得比我更清楚，有很多这样的研究，说老百姓常年吃不到肉，营养状况很不健康。换句话说，就是新世界作物是一个 **Starvation** 食品，它可以让你活下来，但是它不能提供更多的蛋白质和脂肪，总体的营养状况是比较差的。所以，到了马尔萨斯的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因为伯重老师是“加州学派”，这方面有过很多著名的学者，我是帮伯重老师把这块补充一下，因为他没时间讲，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值得考虑。就是到这时候其实是一个临界点，那么你必须采取一些 **Response**，因为你这么多人吃饭，饭是吃饱了，但是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临界点，后来白莲教等等，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当然这么多人，人浮于事，你如果不开放工商，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么多，这时候是跟这事很相关的。我们知道它之后的冲击很多，包括以后国际贸易的冲击。那在国际贸易里面，为什么它能够很好地欢迎新世界的作物，但并不欢迎国际贸易或者说它很限制国际贸易呢？我觉得整个体系跟它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是相关的。就是刚才伯重老师说的，要“持盈保泰”，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故事都可以体现这一点。比如清朝对皇子的要求极其严格，清朝所有的皇帝都是很靠谱的，自身素质都是很高的。即使是水平很差或者说他虽然不是雄才大略，但至少是自身能够作一个守成皇帝是没问题的。而且清朝皇帝个人要求特别高，不管是嘉庆还是后面的道光，

都极其的简朴，这是跟历朝历代都不一样的。我觉得他对自身的要求这么高，但是依然控制不了腐败，采取的措施那么厉害，甘肃官场的问题，就是不自信的一个表现。这么空前规模的一个封建王朝，它很不自信，它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一个就是特权阶层，我觉得历朝历代都有特权阶层，明朝前期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而且杀了一批，但是后来皇子皇孙，说是有几十万还是多少，都是吃国家的粮饷，然后在全国各地。但是皇子皇孙有经济的诉求，但他没有政治权力，是被管得很严的。然而，清朝的八旗，我甚至大胆地说清朝的时候那叫“皇族党”，八旗我可以称之为“八旗党”，他有其政治诉求和经济诉求，他是一个很庞大的集团，清朝政权的维系在于这一级，所以光绪皇帝，刚才伯重老师说光绪皇帝并没有动他们，动不得他们，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跟这个相关的就是赋税的问题，为什么税收不增加？为什么人均赋税减得这么厉害？我最近在写一篇论文，就是研究粮价和赈灾。清朝从康熙的时候就建立了一条全国粮价奏报体系，就是一个地方的粮价一有波动，政府就知道，完了以后就赶紧去赈灾，乃至在全国建了很多常平仓去赈灾。那时候常平仓是很有效的，但是到了清朝中后期常平仓就失效了。赋税这么低，其实意味着是个“小政府”，“小政府”不一定好，一个社会需要一个规模非常合适的政府去提供足够的公共品，所以说清朝中后期叫作 **State capacity**，就是国家能力是非常弱的。为什么它的国家能力非常弱呢？就是因为它不能加赋。不能加赋的根本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不自信，需要收买底层农民。这只是我的猜想，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看到清朝中后期的重大问题确实是国家能力非常的低。

还有我特别感兴趣这方面，因为伯重老师最近写了很多军事方面的文章，我对军事政治史特别感兴趣，我私下里跟伯重老师也沟通的时候就说，你那些书我都看得特别仔细。我在写一篇学术论文，那是一篇宏观经济学的论文，这个论文我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假如你要维护统治，其实你有两个武器：一个叫意识形态，一个叫军事科技。你用哪个武器更有效呢？我觉得就是谁的规模越大，你可能意识形态是更加规模经济的，就用这个去道德劝说、道德灌输，它的 **Additional** 边际成本是很低的，所以大家形成了这个东西，更多的容易就范。恰恰是因为市场规模大，它的边际成本很低，所以它更倾向于用意识形态去稳固人的思想。但是对于军事科技，因为风险很大，也不见得能成功，相对的成本要比意识形态的边际成本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去理解清朝不自信的维护其统治，用的这些方法就是大量的灌输。我在看一些历史书时，上面这么说——“秦王亡于政，清亡于制”，我觉得挺有道理。清朝老百姓的日子还是可以的，但是它是制度彻底的不行。由于它跟底层要维持比较好的关系，以维护其统治，实际上清朝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是比较弱的，对老百姓赋税也比较轻，和老百姓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晚清之后清朝政府就很难去应付之后的这种变局，所以晚清真正的开始变化是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它才真正开始清醒过来。

如果我们再次去反思“洋务运动”到后面的“清末兴政”，其实我并不认为它很失败，我反而认为它步子很大，很多方面是很成功的。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学习人家的经验，教训当然也要学习，但是我觉得要给它足够多的功劳，换句话说来说，这种制度遇到西方这种先进的东西，科技是先进的、文化是先进的，制度你应该怎么反应，怎么样去冲击？我觉得如果你反思清朝、反思很多这时候的一些其他转型国家的例子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是很悲惨的一个事实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成功不成功就是一个际遇，比如说蒋经国的问题。其实慈禧在晚年是很认真地在做这个事情，但是皇族内阁更多的是载沣不够自信。我觉得如果能够延续到 1905 年清末，现在中国可能历史又是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清朝后期的变革是足够多的让权给汉族的地方势力，我反而觉得它做的很多地方都是相当不错的。总体而言，我赞同伯重老师的很多观点，清朝是有很多经验需要我们汲取的，我也觉得清朝很多方面其实做得还是很值得称道的。总的来说，清朝是有好多东西需要我们汲取它的经验和教训。

梁治平：

这个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伯重教授详细梳理了其中的关联性。我记得多年前在某个场合见到戴逸先生，当时他刚去中南海讲了课，有人就问他：国家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主要是怎么处理民族问题。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清朝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正是因为清朝和民国之间一种相对和平的政权过渡——从理论上说，这种转变当然是巨大的，但事实上它的过渡相当平稳——原来的疆界和民族也一起保留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去看清朝经验是有益的。当然，我们是在一个新的时代，面临很多不同的、新的约束条件，有些过去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可能是无效的。比如清政府处理藏地问题就很成功，现在的人可以从中学到一些经验，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主权的观念，清政府派一个驻藏大臣，对藏地有一些控制和约束的手段，藏地保持对清朝皇帝效忠，大家相安无事。现在有了主权只有一个核心观念，问题的性质就改变了，因为主权的事情一点不能含糊，这时候回旋余地就小了。这样的观察视角可能具有启示意义。现在我们开放讨论，大家可以自由地提一些问题或者发表评论，评论简短一点，最好是提一些问题。

贾西津：

我问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可以从清借鉴哪些历史经验？我极为感兴趣的是，您通过这么丰富的史料，到底它的成功有哪些是可以从清代历史中借鉴的？然后这个借鉴我自己最感兴趣的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清代好像并非是说经济不济、国家不强等等，它其实是很强的，那么它的危机因素是什么、从哪里开始？对比现在，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之中，它是不是也隐藏着这个危机因素？这个危机因素是什么？以及它开始的节点在哪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说，到底是通过一个经济的下降来最后产生危机，还是经济兴盛，然后由于某种因素，导致经济下降产生的危机？还是说即使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中本身它就有一些因素，并不是通过经济下降才产生了最后的危机存在，而是这个模式中它自然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因素，最后慢慢地显示出来了，导致它最后的危机？所以我想听您对于这样问题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清朝经济本来是发展的，然后由于某种因素导致经济下降、变化了、经济不再发展了，然后导致了危机，还是说其实那些因素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只是它通过某种因素最后显现出来了，才引至了它最后的转折和变化。您自己的判断是什么？

李伯重：

您提的这个问题难度很大。经济能够持续发展、能够应付大危机，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以前没有能够出现。在16世纪末、17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个全球危机，没有一个国家能逃脱，只有英国经过“光荣革命”，实现了国内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然后才接着出现工业革命。法国原来比英国更发达，也没能逃脱危机，所以后来才有所谓的“法国大革命”。欧洲危机应该是旧制度和旧王朝引发的。在“光荣革命”以前，全世界都是这种旧体制。由于旧体制自身的问题，不管哪个国家，或迟或早，都会导致内在的危机。当然，工业革命的出现除了刚才说的原因之外，还需要诸多条件的配合。英国工业革命也是各方面的原因配合才出现的。“光荣革命”导致的新体制和引发的工业革命有扩散力，所以出现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它这条道路，今天在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这种模式。除此之外，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家能够以旧体制克服危机的。哪怕没有天灾人祸，建立在旧体制上的那个王朝也不可能延续几百年的。在中国，每两三百年就有一次“王朝循环”，而一个王朝维持两三百年，在近代

以前的全世界已经是比较难得的了。

至于清代出现问题，也有很大外部原因。刚才他们两位说的外部环境——全球化导致环境变化，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了 19 世纪，西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由此变得非常强大，中国怎么能应对？第二，1816 年南部火山爆发，导致整个北半球气温变冷，导致了全球的危机，延续了大概 50 年，只有英国逃脱了这个危机，连法国都没有逃脱。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逃脱这次危机。1848 年是整个欧洲革命和暴动的时代。中国的经济衰落从 1820 年左右就开始了，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产物。当时平均气温要比平常年份低 2 度左右。年平均温度低 2 度，一个农业国的总收成可能要减少 30%-40%。这样将有多少人吃不饱饭？

把各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清朝即使没有鸦片战争，即使没有外力入侵，它依然会崩溃。清朝政权自己没有能在变革的动力，或者是羁绊太多，所以这个王朝最后必定是这样的结果。刚才颜色教授也讲了，除非是他放弃内在的那些建制性的因素，但这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先例，即使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从下而上发动，而不是死死保护上层的既得利益。

贾西津：

谢谢李老师！我觉得特别有启发，就是几乎是中国特殊和英国特殊。

邓峰：

谢谢李老师！我也是作法律经济学的，想问两个小一点的，也是我比较困惑的问题，就是梁志明先生一直有一些数据，当然您也提到，就是中国政府的官员数在汉朝的时候大概最多的时候是 12 万，平均维持在 8 万，到了明清以后才两、三万。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有 30 万官吏，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您也刚才谈到有一个“小政府”，当然“小政府”是您想像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中国小的政府，可能明清是最好的“小政府”。另外一个谈法制，我在想，在我们法制史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法制是需要“大政府”，至少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法制维持系统规则的产生、规则的执行，所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还涉及到才讲的税赋的问题，比如你要加税，那么就会产生矛盾。我其实一直没有想明白，明清为什么数字一下子降到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洋务运动”以后，到了 1898 年的“戊戌变法”的时候，我们今天觉得很可惜，我也想请您判断一下，比如说回到那个时代，我们就一个君主、就那么几个官僚，脑子里面对西方世界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也没有舆论的支持，也没有知识界的支持，没有知识分子的支持，而这个改革能搞下去，所以我想向您请教一下。

李伯重：

第一个就是中国政府规模的问题。做这研究的人很多，您如果看看瞿同祖先生写的《清代的地方政府》，是一部经典之作。这部书对清代政府真正的规模作了开拓性的研究。最近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的团队对清朝的政府官员以及衙役作了数据库，从中可以看得到清朝政府到底有多少官员。过去很多估计，现在看来可能有问题，比如说十多年前秦晖就提出秦朝的统治到村，官吏直接到村子里管理农民。我对他说：“这可能吗？秦朝国家有这么大的财政能力吗？”

说到清朝法制，它的正规法系是习惯法，因为很多法律纠纷是可以通过习惯法来调解，特别是在有地方自治传统的地区。如果我们看英国，情况也和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我在

英国时，杜熙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带我去参观 16、17 世纪英国贵族的豪宅。这些房子的窗子，大部分都用砖头封死。我觉得很奇怪，他告诉我说：在那个时代政府派人到乡下收税，是按照窗子收税的，中国政府哪有这样的能力？英国的地方治安官的人数很少，因为有很多事情不一定要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个是英国的情况。那么中国除了法律系统之外，也有民间调解系统。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我不是专门作这方面的研究，因此对此了解有限。

第二个，您说“戊戌变法”成功的可能性问题。我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您说的很有道理。实行戊戌变法的最高统治集团对外界的了解和他们的执行能力都严重不足，那是可以肯定的。袁世凯集团的条件比戊戌变法的决策集团好得多，因为他那批文武官员大多数是从中下层起来的，段祺瑞等都是在外国军校读过书，他们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从下面上来，他用的熊希龄那些人也都是有能力的人，但是中国那个时候很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来做那些事情。

听众：

李老师，请教一个稍微技术一点的问题，本来是一个早几年的研究，但今年李稻葵他们这个团队对于经济史学的测量之后，有一个判断是：在宋代的时候，GDP 是一个高度波动时期，但是在宋之后一直在走下坡路，在清代的时候是一个低于欧洲的。当然因为技术手段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普遍提到所谓用生态法测量。基于这样一个的在经济史上的估计和测量方法上，为什么和“加州学派”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就这点李老师有什么想法？

第二个问题可能跟梁老师相关，因为梁老师这本《清代习惯法》，早年我也研习过，就是基于您这样的习惯法的一个制度供给，对于清代所谓经济史发展、所谓经济发展它这种安排，不像我们原来那种标签化的说没有“民刑不分，以刑为主”的这样一个没有权力保护的判断，那么您在习惯法的角度上来看，它给清代时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贡献？可能您的研究和这个题目也是相关的。

李伯重：

研究历史上的 GDP 是一个新的事情。实际上最早涉及这个问题应该张仲礼先生，他在 1962 年出版中国绅士的收入的书里，就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但他说的过分简单，总的论述只有两页纸，所以他是一个开创者，而真正研究要到 60 年代后期，柏金斯（Dwight Perkins）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中，对农业 GDP 形成作了比较详细的测算。但是他只是讲农业，没有讲其它产业。在此之后，不断有人在探索。我也作过专门的研究。依照我自己的理解，研究 GDP 只能是针对一个短时期（某一年或者前后几年）、一个条件非常相似、空间范围确定的地区。如果是针对一个长达两三百年的朝代、涵盖全中国的时空范围，可能是不适宜的。一个经济体在两三百年的长时期中变化起伏很大，而中国地域辽阔，内部差距巨大，也极难“一刀切”。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选定一些特定的年份和地区，全国主要地区的 GDP 都计算出来，然后再谈一个朝代全国的 GDP，可能会更好。我写的那本书只是研究 1823-1929 年华亭县和娄县两个县（现在上海市属的松江区）的 GDP，当时的人口只有 56 万人。当然，我们也应鼓励各种各样的探索，所以有不同的看法，学术总是在不断地前进。麦迪逊（Angus Maddison）和我多次讨论，我就很直率地对他说：“你对中国历史上的 GDP 的估计，我觉得不可信。”他说：“我知道。这只是一个试探，而且确实没有坚实的支持，结论很可能有错误。我希望你们中国的学者能够来作这项工作。”他说他不懂中文，也不懂日

文，只懂西方文字，而西文文献能提供的东西就是那些。他去世前，我们还在法国谈这个问题。他就特别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努力做这个工作，以纠正他的估计结果。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非常开放，也是非常的公正。现在我们有不同的人做，那当然是探索越多，研究也就会越好。探索也有正确，也有错误，以后交给历史评判。

习惯法的问题当然是由梁先生回答，不过我只是谈一点外行的看法。习惯法有几个作用，在某种情况上我们想像不到。荷兰人统治印度尼西亚时，在整个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不过2千人。英国统治印度那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印度的英国人也不过5千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把荷兰和英国的法律推行到殖民地，但是很多问题还是用习惯法来解决。英国人这点很明智，对一些土邦的习惯法在社会上给予高度承认。而在最上面的则用英国的法律。这也说明习惯法起的作用非常大。清朝在新疆、蒙古和西藏都有专门的法律，但也承认地方原有的法律和习惯法，那么就可以减轻中央政府的很多负担，也可能更适应本地人民的习惯，所以管理成本很小。但各种各样都在变化，假如你要变成民族国家，你必须有统一的法制。当然，具体的事情由梁老师回应。

梁治平：

伯重教授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从殖民统治或者殖民治理的角度来谈的。这方面荷兰很典型，荷兰的法律人类学特别发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香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的所谓中国法律与习惯是从清代传下来的，它支配的领域在不断缩小，但多少还是延续下来了。这些例子能够部分地说明人数很少的治理精英怎么能够治理一个庞大的人口。某种意义上，中国本土历史的发展也可以这样来解释。

中国传统的法律的形态跟西方的很不一样。后来很多人批评中国没有民法，从黑格尔、韦伯到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但实际上，今天民法所处理的很多事情过去在中国也有一套制度和规范来应对，只不过，这些制度和规范很多是在民间层面上形成和发展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习惯法”。当然，我们现在说的“习惯法”这个概念有很多问题，首先，“习惯法”的概念源自欧洲，这个概念是从欧洲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从近代国家法的角度来界定的，而我们讲的这个历史上的习惯法，不一定符合欧洲的标准。另外，中国语境里的“习惯法”，里面包含大量不同的成分，比如说民族性的，刚才讲到的像回疆条例、蒙古条例，它们涉及和针对的是民族性的“习惯法”，涉及一个民族的各类规范。而我们经常提到的民间契约、土地交易，还有各种财产性安排，更像是现代民法的对应物，只不过多半是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习惯法”指的应该就是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在讲“习惯法”时需要辨别清楚的一些问题。不过从前面讲到的治理的角度看，宽泛意义上的习惯法同样重要。因为在传统社会，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远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刚才邓峰提到，法治其实是比较费钱的，而通过一个多元的规范系统来维持社会秩序可能成本更低，这大概是习惯法制度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习惯法问题，我想顺便讲两点。一个是，人们讲到习惯法时很容易以为它是固定不变的，其实不是这样。习惯法是不断变化的。战争、动乱、生态改变、制度变迁、人口变动和社会流动都可能改变习惯法的内容和样态。比如地权形态的演变就是和人口增加、垦荒等因素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面临现代转型的时候，传统的习惯法需要同现代法制相衔接，这对习惯法的影响尤为深刻。

还有一个，人们从现代的形式化的法律观念出发，很容易说古时候产权保护不足，当时甚至产权的观念都不明确。但是按照经济学的观念，产权跟法律讲的所有权其实非常不同，

它更多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界定的。如果从那个角度来看，古代的产权和产权保护程度可能比我们现在通过国家法律确定的某些所有权更明确，也更高。

颜色：

梁老师，我能补充一句吗？伯重老师回答的第一个问题，GDP 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像陈志武老师作的量化历史影响也很大，其实我个人在开始读经济史的时候就一直是做所谓的量化，但我觉得“量化”这个词并不好，我个人更喜欢叫“实证”这个词，就是这是一个实证历史研究。我想实证研究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所以傅斯年以前说大家“动手动脚找东西”。GDP 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我自己也教宏观，宏观我们讲 GDP，它其实是一个 Compromise，就是说你要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但是你又想简洁地了解 GDP，然后它又可以跟你作跨国比较，所以它好像很方便，大家就很喜欢这个词，但我觉得用现代的词套用古代其实是很不恰当的。在做全国性的古代的 GDP 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国家统计局要花多少力量做这个事？做出来之后还要被别人批评。我觉得在一个非市场的经济体里面，GDP 本来的一个定义就是要市场化的一个概念，特别是你像服务业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是过于 Compermise,它的可信度。为了方便比较，我觉得在这方面伯重老师和龙老师都给我们作了非常好的范例，就是你要做只能做一个微观地区，又很好的地方，做一个 Case，华楼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或者比如说契约，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契约，那就是从历史上现在都是有据可来的，或者我们以前作的叫 Global price and income history ,就是物价是实实在在的，工资是实实在在的。咱们比较这个行不行？我觉得也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非要硬套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做了各种强的假设，我是对此持比较怀疑的态度。实证研究有很多种，其实实证研究的方法也有很多不一样，我觉得不能把实证的研究或者量化的研究混为一谈。

梁治平：

还有哪位朋友有问题吗？

听众：

谢谢！我现在谈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我们这次改革开放这么成功，一个就是我们认识到了政府带动和参与全球化竞争，带动全球的科技越来越高端，这是越来越重要的原因。但是，一个时间段内，是不是说其实只要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内统一的、比较稳定的市场，经济就会有提升？就好像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其实都会有这种提升。这个提升是来源于这个地方。它的提升更大的是想适应科技就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所以其实是在那个时间段（挺短期的阶段），其实大部分是来自于“大统一”的分布。就是说，整个清朝在上面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或者从来就没有那个意识去进行一个科技上的竞争，而且他们在主动地回避，这就决定了整个清朝一直往下走的过程，所以是不是我们过于高估了那一段时间经济的规模，而忽略了那个时间段整个清朝政府忽略工业革命的那种状况？那时候清朝政府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所带来的非常长期的、恶劣的后果，这也是整个清朝到最后着急在补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对于这种成功，我不是太懂，因为我是外行，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请教李老师。

李伯重：

近代经济转型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市场发展推动的，被称为斯密型成长，一种是技术和组织的大变革推动的，被称为库兹涅兹型成长。这两种转型是关联的，第一种并不会必然导致第二种，但是第二种是一定要建立在第一种的基础上。清朝建立了中国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市场，远远超过明朝，这个是它取得成功的原因。库兹涅兹成长是通过工业革命出现的，不是每个国家都会出现的，全世界只有英国自行出现，其他国家则不同程度会受到英国的影响，所以英国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工业革命的出现，并没有国家去引导，只有到了 20 世纪才出现国家引导科技发展等等。以前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提供安全、保障国内秩序。工业革命的成就，比如重要的发明和改进，政府并没有起到引导作用，它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到了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落后的国家要想在短期追上发达国家，国家起的作用才特别凸显出来。19 世纪后期日本的明治维新中，政府对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取得极大的成功。但是这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每一个政权做了就一定能够成功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例子就是苏联，苏联在它生存的前 40 年中，在科技上的进步是不得了的。我 1988 年第一次到美国去教书，那时苏联还存在。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的天文学家对我说：“总体而言，苏联在太空技术方面比美国要先进 10 年。”苏联虽然有发达的科技，但苏联经济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所以不是现代经济，而是命令经济，而命令经济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经过市场变革发展都会走向工业革命，只有英国是特例。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荷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英国更发达，但荷兰就没有自行出现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它当然需要技术发明，所以蒸汽机被视为工业革命的象征。但是蒸汽机早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以后在中世纪也不断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实验。罗马时代蒸汽机模型，科技史专家拿来作了实验，每分钟可以转两千次左右。所以蒸汽机的技术早就存在，但它要用于生产，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条件，例如能源、材料和社会需求等。先进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说一个政府重视科技，就可以把整个经济都推向现代。今天北朝鲜也有了核武器，但是他们的经济一塌糊涂。政府只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够引导近代经济转型，但它不可能做到所有。

听众：

我再补充一下，您刚才提到 17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这个阶段其实是清朝的经济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时期，但是之后就开始下滑。那么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是清朝的经济政策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化，还是说有一个什么别的原因？

李伯重：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首先，刚才我已经说了，大概从 1820 年起，清朝的整个经济全面下滑，一个就是气候变冷，全球很多国家都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况且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而且这次火山爆发影响最严重的是北半球，这是最直接的影响。其次，清朝长期积累了一些问题，别的不说，比如人口的性别问题。在清朝，性别比例差异最大的就是华北的一些地方。一个男人没有家，往往就会成为流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后来这些地方成了捻军、义和团、红枪会等运动的起源地。有学者已经作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在清代，华北人民的生活水平虽有上升，但生活水平仍然并不高，只是能吃饱饭而已。但是中国南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华北。鸦片战争前不久，在广州口岸英国商馆高级职员胡夏米（H. H. Lindsay）来到上海，他在 1832 年 6 月的日记中写道：“人口看来甚为稠密，乡民们身体健康，吃得也不错。小麦做成的面条、面饼是他们的主食。我们在此期间，地里

小麦刚收割完毕，土地耕耙、灌溉后紧接着又种上水稻。水稻要到九月份收割。此足见当地土壤之肥沃异常。当地的冬天据说十分寒冷，有些年份数尺深的积雪可经月不化，冰块大量地存放到夏季，主要用于保存鲜鱼。...（在上海县城）除了在中国任何地方都难以买到的牛肉之外，这里各类食物的供应既便宜又充沛。山羊很多，羊肉供应也同样充沛。这里的水果比南方的好得多，我们逗留之时，正值桃子、油桃、苹果和枇杷等上市，价格十分便宜，各种各样的蔬菜供应也十分丰富”。中国各地之间的地区差异极大。这也是些非常严重的问题。更不用说 1840 年的清朝军队已经是一支连白莲教农民都打不过的军队了，当然无法有效镇压国内暴乱和对抗外敌入侵

就在此时，由于屡战屡败，清朝不得不不断割地赔款，使得中国经济严重失血。外国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市场分割了。因此原来导致 18 世纪繁荣的主要原因，如安定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统一的国内市场、蓬勃的海外贸易都没有了，中国的经济怎么会好呢？虽然由于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技术上有些进步，但是对于民间经济的振兴，却起不到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是清朝为什么转向衰落的原因。

听众：

李老师，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对比清朝之后的开放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它们有一个挺大的不同，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民间的企业很快吸收西方的技术，然后做大做强，但清朝之后的民间吸收西方技术的动力不是很强，而且还需要官方去帮助或者推动西方的技术，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

李伯重：

你说的现在民间积极性高，那确实是。改革开放已经是 20 世纪后期的事了，在前 30 年多么封闭，但是一般中国人对外界的了解总比清朝一般人对外界的了解还是多得多。但是你说的另外一方面，清朝官方推行先进技术。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推行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在压制民间使用先进技术，例如李鸿章建立江南织造局，规定在多少年之内民间不得办类似的工厂。民间并不是不积极接受西方的技术。上海租界建立以后，大量的中国近代企业出现，它们都接受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进行生产。这就像你说的只要有钱赚为什么不赚？中国的商人是很精明的。

听众：

可能是官僚腐败，而其他的不能.....

李伯重：

日本明治维新中，政府也建立了很多国营企业作为现代企业的样板，但最后都卖掉了，不和民争利。

梁治平：

好，提问的时候请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

听着：

我是出版公司的社科编辑，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对生产力对社会的破坏性很关心，刚才颜色老师也提到，在清朝后期出现了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劳动力的结构已经不再适合最新发展。对于劳动人口结构问题，社会应该有什么好的办法？在西方有什么好的经验呢？我想了解一下。

李伯重：

这个我恐怕没办法回答，但是你说的这点很重要。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 10 年前，欧洲就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在反对经济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确实在全世界造成严重的分化，发展中国家是最大受害者，因为它们人力资源属于低端，那么它们就没有办法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很大的好处。相反，中国是在全球化中得到好处最大的国家。经济全球化当然也会造成两极分化。这就要看中国能不能极大地提升教育，让人民能够适应更好的工作以及机制。前一段我看微信上有一个斯坦福教授的研究的报道。他研究中国问题十年了，说中国农村孩子三分之二都不能读高中。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普遍都是高中毕业。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走在前面。所以这是中国政府必须要解决问题。

许存健：

我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许存健。李老师我想向您请教，现在出现了一个争论，就是胡铁球教授的《明清歌家研究》提出明清基层市场化，就是我们以前弄的“皇权不下县”当中，就是由宗族和乡绅治理地方，现在他们在维持着这个歌家牙行，由中间商来负责基层的治理和收费的这种行为。不知道您对此有何看法，当然现在产生了一种争论，范金民教授还是有一个主要是乡绅乃至民俗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跟颜色教授请教一下，就是我其实对中国清末也是比较关注，我而且我觉得它的政策的制定也是特别好的。但是因为我最近关注赔款的问题，在庚子赔款以后，就是 1900 年以后可能需要支付 5、6000 万两的赔款给国外，包括它把严苛和常关税抵押出去了。到了大概 1909 年和 1919 年左右，地方就拒绝向清政府提交自己所负责的赔款，然后清政府不得不实行“铁路收归国有”，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财政的崩溃跟清政府的崩溃是不是有必要的关系？

李伯重：

关于国权是不是下到乡村的问题，现在争论很多。我的感觉中国那么大，历史那么长，所以必须是具体到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期来看问题。至于全国在一个朝代中国权是否“下县”或“不下县”，现在还不能作判断。前些日子武汉大学陈锋教授谈到复旦大学张海英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就分析这个“下县”、“不下县”的问题做了很好的分析。即使是在江南这样的地区，“国权”在某些方面上确实下到了乡村，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则否。所以不能够一刀切地说“下”与“不下”。张文说在经济活动中，政府有些是通过直接管理，有些通过间接管理。如果像江南这样的地区，在行政方面，至少是县和市镇两级，国权是达到的，通过巡检司等机构，在一些方面这种权力也影响到农村。又比如说清朝的旗人管理，不仅下到县，每一个旗人都被他管着。李中清教授团队作的清代人口的研究，在沈阳附近的道义屯，从乾隆时代到清末，所有人的户口严严实实的都记录在册，哪一天出生、哪一天死都非常清楚。这样，

国权不仅下到县，而且下了到村、下到了每一家一户。所以要因时因地去研究，泛泛而说不是太合适的。

颜色：

我简单说一下，时间的关系。关于刚才这个问题我还要补充一句，我最近在写一篇论文，还没有写完，但是在会上也开始讲了。我同意伯重老师的观点，你得看哪个方面，还有哪个地区。况且有的地方下来了，有的地方没下来，然后有些方面下来了，有些方面没下。我最近的一个研究就是看在出现自然灾害，粮价波动的时候，政府的常平仓的作用和士绅的作用。我看在全国范围内其实还是常平仓到时候重要，就是说政府的救助体制还是更重要。但在江南我们还是用了伯重老师定义的“江南”，因为江南各个地方不一样，您是比较更江南的江南，对吧？对，我用那个就发现在出现粮价波动的时候，政府在救济方面在江南地区士绅的作用是 **Dominate**，士绅的作用是显著的一个关系。我们当然是作合规的一个结果。但是这要配合历史的各种因素来看。第二个问题财政，我就非常简单地回答。我当然是认为清朝最后确实是地方坐大、尾大不掉，当然财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都是有共识的，就是关于“离京”的问题，“离京”从曾国藩开始叫旧地重享，然后开始“离京”。之后，各个州府都自己干自己的了，最后出现了“东南互保”，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财政崩溃，那是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权的独立，因为以前全是收支减徭献，后来地方政府坐大，跟财政是有紧密的关系。但是最后我想补充一句，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形成一个中央与地方的一个 **Constitutional relation** 系统，关于财政的问题。所以，它依然是因人因时因事而调整。那么这个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且会绑架一些政策，比如朱镕基总理强势的时候，我们推了“分税制”，到现在为止也有 25 年了，现在地方与上面的财税关系就很合理？现在学者讨论得也非常多，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十九大”还要再讲进一步改革，我觉得所有的改革当中中央与地方的财税管理是最核心的，而且是最难啃的骨头。

董裕平：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这个演讲，我受益良多！时间关系，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清代最后无法真正改革的两大阻碍：一个是不能去推动特权阶层，尤其是对旗人。旗人这么庞大的集团，实际上跟它“永不加赋”的政策是有矛盾的，导致他必须去腐败，因为国家供应增长快，而赋税加的那部分可能比较少。再一个，清朝的官员薪水很少，但是过一次生日就可以了，这个在今天我们看到有些时候也是类似的东西。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他就去搜刮民财，这个对特权阶层的利益触动是非常之难的，这个大家都清楚。

第二个就是说腐败，腐败是清代国家一统以后，以前的边防问题不存在了，漕运的问题也没什么问题，最头痛的是吏治的问题。吏治的腐败历朝历代总是处在循环当中，这个可能跟我们制度设计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制度设计最后的支撑是不是有个第三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洋务”以后一直到 1919 年的“五·四”（马上就 100 年了），实际上是“打倒孔家店”，这时候对儒家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一个强烈的批判和反对。这里面是不是说真正阻碍他改革的，前面两点我都认同，是不是还应该有第三点，恰恰就是传统的儒家的意识形态？在某种角度上来讲，它进入千里模式的这样一个……，因为成“圣人”嘛，他是“至善”的。我们看周礼那个年代，就已经把农业社会应对危机的一些政策设计得那么样的详尽，所以贾谊在给汉文帝上书中讲到：“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就是说，制度设计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很完美。就是梁老师讲的习惯法，就是社会层面上的这个东西从商周变革以后那是一个很大的一

块，宗法制度在这里面确立，社会自治的这种制度。而儒家形态最后这么多年的动态变化，最后到清代的时候，它面临一个外来就是费正清讲的“冲击-反应模式”的，这个冲击进来以后，它根本就没办法应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补充第三点，可能这恰恰也是最难变革的一块，儒家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国特色，可能是最根深蒂固的东西。我想请问李老师，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李伯重：

我可能就没有多少资格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不作思想史研究。但是我觉得在儒家意识形态自出现以来到清代末年的几千年中，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所以不能用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去看儒家的意识形态，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儒家原则，到了清代还是一成不变吗？清代的魏源、陶澍这些儒家，他们的思想和孔子、孟子已有很大的不同，而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儒家，他们和孔孟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儒家意识形态在不同的阶层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儒家中的精英阶层和下层（像范进这样的人），对儒家的理解也是有所差异的。所以还是要具体的看。第二，关于儒家和近代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现在也有很多讨论。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杜维明就鼓吹“新儒家”，希望把儒家和近代搭上关系。所以，儒家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题目，我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我也没法回答。但我只是觉得曾经（可能我说话冒昧一点），像在改革开放前，把儒家思想说得一塌糊涂，而在今天，“新国学”又把儒家捧到了天上，恐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从学术来说，还是要持一个公正的态度。

梁治平：

因为时间关系，提问就到此为止。最后伯重教授可以有一个全面的回应，当然刚才已经作了很多回应，如果您觉得刚有什么具体需要回应的也可以回应。

李伯重：

我倒没什么具体回应，我只是觉得这么冷的天，又是星期天，大家跑到这儿来，对这样的题目感兴趣，令人很感动。老实说大家坐在这儿，只是听我空谈而已。但是大家对这些历史的问题感兴趣，很感谢大家！大家提的有些问题也是从不同的观点给我们启发和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所以谢谢！

梁治平：

非常感谢伯重教授今天的报告。伯重教授很谦虚，但就是对那些他说自己不在行的问题，他的回答也给我们许多启示。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眼界与情怀，也展示了历史研究的价值。两星期前孙歌教授来作了一个思想史方面的报告，里面提到日本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如果大家读过沟口雄三的研究，可能会有一种印象，严肃的思想史研究，并不是要刻意地去影射什么，但却可能不同程度地回答了我们当前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中国这 100 年是这样的走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些口号？今天在所谓的战略导向上面、意识形态的口号里面，好像有了很多变化，但是还能看到历史的脉络和线索蕴含其中。还有比如像社会学的研究，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教授的一项研究就试图要回答刚才颜色教授讲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描述了一些中国几百年、上千年一直在回答、回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好。当然不是说一切都没变，而是可能由于路径依赖，比如说人

口和幅员规模和一些基本的约束条件还在，所以那些问题还在，需要我们今天在新的条件下去回应。当然历史不可能给我们答案，因为历史都是具体的，不可能完全再现在当代。但是研究历史会给我们一种启迪、一次思考的机会。对历史的回顾能够丰富我们的想法，帮助我们重新去认识今天，但问题本身还是要我们自己去解决，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功用。今天伯重教授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所以，非常感谢伯重教授！感谢登高教授、颜色教授，还有各位的参与，谢谢！